

**CERI**

长江教育研究院

Changjia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教育智库  
Thinktanks

2022年9月刊

总第51期

**P01 卷首语：**

**周洪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迈向教育发展新征程**

# 目录 Contents

---

## 卷首语

---

- 01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迈向教育发展新征程 周洪宇

## 院长视点

---

- 08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 周洪宇 付睿  
14 新文科建设的宗旨、任务及前景 周洪宇 陈诗

## 专家观点

---

- 29 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事件  
——写在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颁布之际  
钟秉林  
42 有什么样的中考，就有什么样的义务教育样态  
张志勇  
46 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 张炜



欢迎与我们互动

##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迈向教育发展新征程

来源 | 《中国教育报》2020年11月12日第6版



**周洪宇**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

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在这个伟大时代背景中和关键时间节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这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新主题、新方向、新目标、新任务。

根据新发展理念以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基本精神,“高质量教育体系”指向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加满足多样需求、更可持续发展、更为安全可靠的教育体系,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教育体系。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描绘了蓝图,为迈向教育发展新征程指明了方向,对于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 一、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迈向新征程的必然要求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也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

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向好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仍然存在,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同时,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挑战,关键在于办好自己的事,提高发展质量,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之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教育也必须适应新变化、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视察湖北时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

发展理念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建议》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点任务作出工作部署，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就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高质量发展中包含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容，全会提出的“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可以为之提供知识支撑和人才支撑。

## 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建成教育强国的客观需要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十三五”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开启了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历史新征程。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时代主题与根本要求，优先发展教育是总的指导思想，加快教育现代化是主要目标，深化教育改革是核心动力，建设教育强国是历史使命。

要主动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从大到强的新趋势、新特点和新需求，建立新的发展观。因此，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加快教育现代化，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学有所教”到“学有优教”，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成为教育发展的战略主题。

即将开启的“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国民素质现代化，基础在教育。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建议》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包括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等，这些都与教育改革发展创新密切相关，以教育发展为基础和前提。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既是建成教育强国的重要内容，又是其重要保障。

### 三、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建议》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部分，以“高质量教育体系”为主题，对其所涵盖的方面作了论述。结合新发展理念，从其涵盖的基本内容看，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大致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

首先，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要明确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这就是新发展理念，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教育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让创新成为教育发展的第一动力；绿色成为教育发展的普遍形态；不同层次、不同类别教育之间协调发展；开放始终是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教育发展的根本目的。

其次，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还要明确其工作方针、工作机制、工作宗旨。这就是《建议》里指出的，“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提升教

师教书育人能力素质，增强学生文明素养、社会责任意识、实践本领，重视青少年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教育”。

再其次，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还要明确其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在具体工作上，需要从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着手，以推进教育现代化：

**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要求，“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鼓励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在具体工作上，一是要大力推进教育公平，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继续支持新增教育资源重点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倾斜，推进城乡教育、不同区域教育和学校之间的协调发展。二是要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鼓励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注重发展学生核心素养，鼓励学生创新，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探索有利于个性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三是要坚持立德树人，全面加强学校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指导，让优秀中华文化不断得以传承创新和绵延发展。四是要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五是要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要求，“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一是要积极构建高等教育分类体系，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推进研究型、应用型 and 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高等教育共同发展。研究型高等学校主要以培养学术研究的创新型人才为主，开展理论研究与创新，学位授予层次覆盖学士、硕士和博士，且研究生培养占较大比重。应用型高等学校主要从事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的本科以上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并从事社会发展与科技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职业技能型高等学校主要从事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专科层次技能型人才培养，并积极开展或参与技术服务及技能应用型改革与创新。同时，各地要依据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对接区域产业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对人才的需求，合理确定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明确高校的办学定位、服务面向和学科专业布局。二是坚持开放的发展理念，优化教育对外开放布局，提升教育开放的层次和水平，不仅加快教育国际化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进程，而且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经验，促进中国教育参与国际教育分工，推进新的国际教育格局形成。

**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要求，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一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除了国家投入，还要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二要推进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变革，实现职业教育和培训学校系统管理的有机统一，将职业教育资源系统整合起来，避免行政分割、政出多门、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的职业教育管理格局。三要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实现“三统一”和“三整合”。“三统一”，即学历与证书的统一、理论与实操的统一、学历培养的系统教学目标与就业培训的教学模块统一；“三整合”，即教育与培训资源配置的统一整合、教育与培训专业的分类整合、教育与培训等级衔接的有机整合。四要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建设高质量终身学习与教育体系。**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要求，“发挥在线教育优势，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与教育体系要求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中



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一是要构建更加开放畅通的人才成长通道，完善招生入学、弹性学习及继续教育制度，畅通转换渠道。二是建立全民终身学习的制度环境，建立国家资历框架，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工作机制和专业化支持体系。建立健全国家学分银行制度和学习成果认证制度。三是强化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继续教育与社会培训服务功能，开展多类型多形式的职工继续教育，扩大社区教育资源供给，加快发展城乡社区老年教育，推动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与此同时，终身学习与教育体系还要求各级各类教育实现有机整合、有效衔接与相互沟通。

**建设高质量教育保障体系。**一是加强党对教育改革的全面领导。引导广大师生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顶层设计，编制好、衔接好、落实好“十四五”时期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 2035 远景规划。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深化教育“放、管、服”改革。大力扶持第三方评估机构，加强教育智库建设。二是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立完善教师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实行教师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计划，构建现代教师教育体系。三是健全完善教育投入的长效机制，完善教育投入结构，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经费使用机制。四是加快完善教育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实现学生全面发展。健全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健全“破五唯”的教育评价体系，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五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各届全会精神，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教育立法和修法进程。六是加快实施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周洪宇 付睿

##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

来源 | 《中国教育报》2022年10月13日第7版

经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我国总体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有序参与、法治化保障、信息化引领、各方合力推进、监督有力、开放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该体系的领导主体、治理结构、教育制度、教育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教育文化等要素相互促进，政治方向、价值取向、目标导向和结果指向融为一体，契合了国家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规律及需求。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先导性地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入“十个明确”。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建设已取得重大成就，总结提炼相关宝贵经验，对未来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一、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教育治理水平不断跃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的形成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教育，充分发挥了教育在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争取革命胜利和民族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

提出“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的奋斗目标。延安时期，共产党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 30 多所学校，在教育方针、办学方针、师资队伍、校风学风等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并促进了延安精神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教育中，开展了新民主主义教育实践，在农村革命根据地、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分别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方针与政策，建立了教育行政系统与学校系统，开展了诸如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干部教育和识字运动等各级各类教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前期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初，新中国对旧教育进行接管、改造，各级各类教育均由国家举办，教育格局以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为主导，随后全面学习借鉴苏联教育模式，开展各级各类教育改革与实验。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党和政府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上推行简政放权策略。1985 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教育改革的序幕，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逐步扩大地方政府教育管理的权力、职责。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大省级人民政府发展和管理本地区教育的权力以及统筹力度，促进教育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201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办学体制，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该阶段我国教育管理体系逐步向现代教育治理体系过渡，意在寻求各教育参与方关系的平衡，在遵循教育规律与秩序的同时注重激发各参与方的活力，有力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的拓展与深化。

第四个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建设驶入快车道。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种从教育管理的传统

形态向教育治理现代形态不断变迁的过程。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终极价值目标是提高教育效能，促进教育公平，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我国教育管理体系开启了向新时代教育治理体系转型的进程。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到2020年，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提出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这是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的奠基性工程。党的十九大以来，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确立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战略任务，着力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筑牢基础性的制度体系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四个历史阶段紧密衔接，承前启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初心，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的坚强领导力和执行力。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底色

百年奋斗历程证明，党对教育事业治理的方式源于其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知及长期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故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底色。

一是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我国的教育治理体系实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结构化显现，坚持党的领导是确保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朝着历史正确方向迈进的根本保障，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的核心。坚持党的领导才能高效构建教育治理体系新格局，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是坚守教育为了人民的初心。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遵照以人民为中心的总体要求，坚持教育的人民性，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体系，让每个孩子、每个家庭能享有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需求。

三是注重教育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相结合。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既注重加强顶层设计与局部阶段性改革开放相互协同，又着手建立完善政府统筹、府际协商的教育治理机制，理顺部门之间的关系，并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和改革探索，确保了中央与地方在教育治理体系中的良性互动，理顺了不同地方政府间在纵向和横向上涉及教育领域的复杂关系。

四是注重“管办评”分离、“放管服”结合，明确主体责任，激发办学活力。实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简政放权，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重构新型政校关系，一直是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主线。具体而言，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建立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政府依法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有序参与、各方合力推进的教育治理格局逐步形成。

五是注重教育法治建设，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当前，我国已较完善地构建了一套适合国情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为国家教育事业治理法治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全面加强教育立法、推进教育治理法治化与制度化，提高教育法治化水平，健全学校办学法律支持体系，加大教育执法监督，构建了政府依法行政、学校依法办学、教师依法执教、社会依法支持和参与教育事务的教育治理新体系。

六是注重政校社合作，凝聚三方合力。自从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以后，政府、学校关系演变成政府、学校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推进以“管办评”分离、“放管服”结合为核心的治理体系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学校、社会之间关系得以重塑，各种社会资源参与办学、教育服务、支持、监督与评价等事务。构建服务全民终

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有利于打通不同教育参与主体、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隔阂，教育治理体系建设迈出新步伐。新时代进一步强化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颁布家庭教育促进法，家庭教育成为国家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

七是以信息化作为教育治理的现代技术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教学、教师和学生信息技术能力养成等方面取得了质的飞跃。信息化作为支撑教育治理的现代技术，带动了教育形态走向现代化。随着以信息化为基础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得到有力提升。尤其是疫情期间，超前的信息化建设为我国特殊时期开展教育治理、实施大规模在线教育提供了有力保障，在全球教育领域影响力显著提升。

八是以健全教育督导制度体系为保障。教育督导制度体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的保障性工程，包括教育监督、评价与问责等一系列制度机制，可以确保教育治理系统的正常运转及作用的发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拟定教育督导规章制度和标准。各级教育督导机构要严格依照《教育督导条例》等法律法规，强化督政、督学、评估监测职能。依法依规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督导，促进教育公平，全面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此同时，地方各级教育督导体系也已逐步建立。中国的教育督导制度体系通过建立与完善教育行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制度、学校评价制度、教育问责制度，重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确保了教育治理能力的形成及有效发挥。

九是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由弱变强，参与深度和广度逐步拓展。中国与世界各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及跨国企业、智库等开展教育事务合作，支持国际组织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及教育分支机构，通过各类国际平台主动参与全球教育活动，积极实施对外教育援助，中国参与全球教育规则与标准制定的话语权逐步增强，教育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 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的形成历经从集权到分权、从政府统揽到政府与学校、社会共同治理的变革过程。经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我国总体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有序参与、法治化保障、信息化引领、各方合力推进、监督有力、开放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该体系的领导主体、治理结构、教育制度、教育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教育文化等要素相互促进，政治方向、价值取向、目标导向和结果指向融为一体，契合了国家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规律及需求。

党对教育事业的治理思路、方式及手段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观中国共产党教育领导方式的百年演进过程，经历了“组织”“管理”和“治理”三种教育领导方式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的构建呈现出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坚持党的领导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的核心，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的基础，追求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的基本价值追求，注重继承弘扬优秀教育传统与吸收国外先进教育理论实践相结合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的历史根源和镜鉴，多元主体参与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的内在需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建设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地开创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并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集中展现，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写照。

当前，我国面临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与国内教育发展转型的双重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体系建设仍处于持续变革与自我完善过程之中，必将为达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周洪宇 陈诗

## 新文科建设的宗旨、任务及前景

来源 | 《中国教育报》2022年10月13日第7版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国际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对内中国要继续朝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努力，对外要为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条件。在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应对国际竞争的过程中，文科需要发挥关键作用，在人才培养、理论创新和跨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突破性贡献。这就要求文科与时俱进，积极转型。2018年8月，国内首次提出“新文科”概念。不同于在美国，“新文科”是由学者提出以应对科技革命带来的“文科危机”，我国的“新文科”自一被提出，就被政府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肩负推动国家高质量发展、助力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历史使命。

当前关于新文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在持续推进中。已有不少文章对新文科的内涵、建设路径进行了论述，指出了新文科新在学科的交叉融合、新在中国特色的主体性回归、新在新技术的应用等；探讨了如何去实现学科融合、如何在文科中运用新技术、如何打造新文科课程等。但对新文科建设的宗旨、任务和前景还缺少深入探讨。为使新文科建设的方向和重心更加明确，需要对新文科建设的宗旨、任务以及前景做进一步综合分析。

## 一、新文科建设的宗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内外部挑战。当前，中国的新文科建设应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旨在培养中国立场的时代新人，创造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提升本国的国际影响力。

### （一）培养中国立场的时代新人

新文科建设，从文科教育的角度看，是要培养中国立场的时代新人。中国立



场有两层含义：一为知中国、爱中国，二为人民的立场。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在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中指出，建设新文科就是创新文科教育，要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要培养新时代社会科学家，构建中国学派，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新文科所要培养的时代新人应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中国声音的传播者、中国理论的创新者、中国未来的开创者。一言以蔽之，新文科所要培养的正是深谙中国发展之道，坚定国家立场、守护国家利益的时代新人才。

如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时期，是总结历史经验、开拓新局面的关键时期。在取得巨大历史进步的同时，我国改革也进入了攻坚区、深水区，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而日渐突出，经济发展在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下表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未来的持续稳定发展、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高校新文科发挥作用，培养出更多清楚中国发展优势、明晰中国发展问题的实干人才，孕育出能为中国发展提出大而久之道的大师。

尽管全球化推动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意识，但是“当今时代民族国家仍占据统治地位并掌握大部分权力，同时全球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纷争更会强化国家存在的意义”。疫情背景下，中西方制度竞争底色进一步凸显，意识形态竞争愈演愈烈，意识形态风险增加。须知“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文科人才作为未来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群体，必须提高政治站位，紧紧围绕在党中央周围，同下“一盘棋”。因此，新文科培养的人才不仅要知中国，而且要爱中国，坚定中国立场。

中国立场进一步而言就是指中国人民的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人民的立场是文科工作者创作、创造的基础。毛泽东曾指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要眼睛向下，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故事，“一切实际工作者

必须向下作调查”。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能在对新文化的探索中发现一条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正是因为他们把人民的生活看在眼里。今天，中国能取得新的成就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新文科教育需要培养具有人民立场的时代新人，眼中有人民、心中有人民的人才才能为中国灌注永久的生命力，使中国持久地发展。

爱中国、知中国和人民立场其实是一体两面，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才能读懂中国的发展，认同中国的制度，找到中国方案。也正是因为理解了中国的历史，认同了中国的制度，才更能坚守人民立场。只有坚持这种立场的人才才能真正服务于中国发展，因而新文科建设必须以培养具有中国立场的时代新人为宗旨。

## （二）创造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

新文科建设，从文科研究的角度看，要创造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现代化中国的建设既需要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需要不断总结现代中国的实践经验，提炼中国的现代精神。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是中国文科强起来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当前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深受西方学术影响，从理论方法、思维方式到考核标准都表现出西化倾向。虽然中国文科一直在向西方学习、看齐，但整体实力始终无法实现超越，甚而还有差距。这主要还是因为过度依赖西方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本土创新不足。须知西方思想理论根植于西方社会的发展，尽管理论成果是没有国界的，但是孕育理论思想的沃土是有疆界的。西方理论的成就离不开西方学者对本土实践成就的追问。而就某种程度而言，中国文科的困境正源于自身传统的断裂以及对自身发展成就追问不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深刻的启发性，譬如“君子和而不同”就表现出了先进的国际合作理念。几千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和沉淀，深刻影响了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使得中国的技术发展始终没有偏离伦理道德的轨道。如辜鸿铭所言，中国人有一种善解人意的力量，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孩童的生活”。当代人需要通过传统文化进入古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从而挖掘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奥义。当今学界需要更加旗帜鲜明地结合现代科技革命新局面和国际较量新形势发展传统文化，将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发展智慧引

申到世界的发展上，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开创道路。

在中国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现代中国的实践探索为理论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新文科应当抓住此机遇。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但当前学界对自身成就的追问还不够，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道路’，但学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及其规律的总结研究不够，根植于中国文化的管理经验和本土案例提炼分析不足。”要想提升中国文科实力，必须扎根本土实践，创新理论。“人文学科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发言人’，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必须扎根中国‘现实生活的情境’，其世界一流的标准既要与人类其他文化对话，又要用中国‘自己的话’解释‘中国模式’。”当前中国需要具有国际水准的优秀本土研究，向世界学者展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成就和中国理论的先进性。因此，新文科的发展需要坚信中国价值，关注中国问题，解释中国现象，形成中国理论。建设新文科要以创造根植于本土文化、本土实践的中国特色思想理论为要旨。

### （三）在国际上传播中国价值、形成中国影响

新文科建设，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要在国际上传播中国价值、形成中国影响。当前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相较于西方国家仍有差距，我国文科上的现代成就，少有能走出国门、形成国际影响力的。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文化影响力在当今国际竞争中仍表现弱势，每当有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暴露出国际影响力不足、话语权薄弱等问题。譬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就出现了西方媒体大肆抹黑中国的情况，针对中国的负面话语充斥在国际舆论之中。西方价值在国际和国内的影响力随处可见，但是中国价值还未真正地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西方世界的刻意打压、针对确实阻碍了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和国际形象的塑造，但同时，

中国的文科还没能挑起传播中国价值、塑造中国国际形象、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大梁。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当前，中国迫切地希望通过发挥囊括文、史、哲、经、法、管、教、艺八门学科的新文科的作用，来提升自身的文化软实力，使中国特色文化走向国际、影响国际。

当今世界已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地球村”，中国要彻底实现崛起，不仅要实现内部的变革，而且要成功应对复杂的全球性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长期化的大背景之下，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风潮迭起，国际冲突加剧，中国无法独善其身，势必要继续深入推进全球治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在资本主义危机暴露、资本主义内在制度受到挑战的情形下，为人类文明发展提出新的解决方案。面对来自西方强国的全面战略遏制，中国需要突破遏制，进一步提升影响力。高校作为学术研究重地，要积极搭建平台，当好跳板，加强文科的对外合作交流，不仅仅是向外取经，更要自信地对外施教。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果，以国际学术界看得懂、能接受的方式，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作为日益崛起的大国中的一员，高校文科师生、研究者应该满怀自豪，树立雄心壮志，拥有时代赋予的魄力和担当，这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理论，将中国价值推向世界，用中国文化影响世界，助力中国更有力地履行国际义务、推进全球治理。

总体而言，新文科建设要服务于我国的教育强国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满足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当代新文科建设的“生命之根是对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文化的坚守，是其在弘扬中国价值、展示中国魅力、彰显中国特质中发挥的意识形态贡献力”。《新文科建设宣言》也指出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坚定文化自信、培养时代新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文科教育融合发展都需要新文科。因此，要通过改革文科教育，培养新时代中国立场的人才；要通过发展中国文化、肯定中国成就、研究中国问题、解释中国现象，

创新中国理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要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好中国形象、输出中国理论，传播中国价值、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 二、新文科建设的任务

根据新文科建设的宗旨，可以进一步明确新文科建设的任务。宗旨指明了任务方向，而国家改革规划则为任务拟定提供了基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2021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再次强调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强调：“要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围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要增强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力，培养更多适应高质量发展、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各类人才。”在此背景下，新文科的建设与整体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是同频共振的。新文科建设要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整体性角度考虑，要在参与整体体系建设的同时，从体系上获得支持以满足新文科的需要，达成其育人、理论创新和文化传播的总目标。总体而言，新文科建设应完成“课程改革”“体系调整”“成果输出”三个方面任务。

### （一）改革课程，切实发挥文科育人作用

课程教学是育人的主要环节，课程改革是推进育人模式转变的关键。欲培养中国立场的时代新人，就要把课程改革视作新文科建设的重点任务，切实发挥文科课程的隐性作用，扩大文科课程的影响范围。结合当前文科课程现状和未来新文科走向看，新文科课程改革应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文科教育充分融入各专业学习中；二是将文科教育与日常生活实践紧密联系起来。

#### 1. 将文科教育充分融入各专业学习中

文科教育承担着向所有学生传授文化的职责，这种文化用奥尔特加·加塞特的话来说就是“时代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它影响着人们生活的信念、国家认同和对现实世界的理解等，无声无息地指导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对每个人的成长与生活发挥着重要的隐性作用。文科教育不能限于文科专业，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发挥作用，产生影响。要将文科教育充分融入各专业知识学习，具体而言就是需要改革作为通识课程的文科课程，加强各专业学科史课程建设和发展融合课程。

**第一，改革作为通识课程的文科课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大学通识课程是文科工作者发挥价值引领、立德树人作用的重要阵地，也是理工科专业学生接受人文教育的主要途径。但无论是作为必修课还是选修课的文科通识课程，尽管其价值被反复强调，在实践中却都仍然普遍受到边缘化的对待。改革文科通识课程，要改变文科通识课程边缘化、形式化的现状，加强文科各个专业的合作，共同打造真正能感染学生、影响学生的文科通识精品课程。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更应当加强文科通识课程建设，要能与网络上泥沙俱下的信息和价值观竞争，充分发挥其以文化人、价值引领的作用。

**第二，加强各专业学科史课程建设。**就如托马斯·库恩所言，“如果我们能学会用‘按我们确实知道的去演进’取代‘按我们希望知道的去演进’，许多令人烦恼的问题就会在这过程中消失”。学科史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学科史课程的薄弱环节是中国古代在该学科方面的探索。由于当今现代分科方式是从西方的学科实践发展而来的，所以许多学科的学科史课程内容往往以西方学术史为主。但是每个学科的中国传统中都蕴藏了丰富的信息，是认识、理解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从中国数学史中可以了解到，“以田亩赋税商业等等实用计算为主的《九章算术》在中国的渐渐繁盛和以天文学的数理计算为主的《周髀算经》一系的渐渐衰落，使中国与西方数学发展出现了相当不同的路向，而数学的不同路向又影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通过这些知识，学生可以更进一步理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与西方到底有何不同。在真正理解传统的基

基础上，树立起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找回中国自己的话语。在帮助学生理解知识演变的过程中，将学生培养成有守正创新能力和家国情怀、家国担当的人才。

**第三，发展融合课程。**融合课程通过文科内部学科相互融合，以及文科与非文科学科相融合的方式，将文科教育融入各个专业学习之中。如今融合专业、融合课程在新文科建设中备受关注。但融合是一种手段，并非目的，所以融合一定是根据需要进行的。譬如，要想让学生加深对现代中国的认识，就不得不涉及一些综合性议题，需要打造相关的融合课程。发展融合课程要解决融合多但各不精的问题，因而在实践中，搭建好融合平台、加强学科之间的课程合作和共建是首要的。

## 2. 将文科教育与日常生活实践紧密联系

文科研究不能只做书斋里的学问。同样，文科课程也不能只教书斋里的学问，还要走出书斋，走进生活。“对于人文学科而言，理解和阐释是其核心的对象和方法。”文科课程要培养学生的理解力，使学生真正理解文科知识，但是不能仅仅依靠书本知识的积累来培养学生的理解力。不能仅仅用书本知识教学生理解书本知识，还应该带领学生观察生活、调查生活，使之在对大众生活的观察和体悟中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学生的理解力会受到他们生活的环境、身处的阶层所限。教育本身就是分层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凭借其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方面的优势获得占据优质教育资源的优先权，从而导致学校之间产生了分割现象”，优势阶层和弱势阶层的孩子往往分别集中于不同的学校。他们对不属于自己阶层的环境和生活是缺乏了解的，譬如在优渥环境中成长，享受着丰富教育资源，逐渐成长为精英的学生，难于理解普通学生与他们的差距可能正是资源的差距，也很难看到社会的前进是如何与千千万万沉默而普通的大多数相关的，所以当他们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也许更容易内化英雄史观而非人民史观。

让学生走进社会，走入生活，是为了让他们迈出其狭小的生活环境，去看到更多元的人生。文科知识本就是围绕着“人”而产生，“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

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文科课程要充分发挥育人作用，便是要学生眼中有“人”，有人的生活。要在真实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实践中看到“复数的人”。

## （二）调整体系，为理论创新创造良好条件

文科的理论创新不仅需要个人在学术上的努力，也需要获得体系的支持。结合国家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需要来看，当前新文科建设需要调整的体系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调整专业结构，二是调整评价体系，三是重建知识体系。

**第一，调整专业结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要“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学校综合改革，构建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要“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和特色发展引导机制，增强高校学科设置针对性”。可以说，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是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建设新文科的基础性任务，新文科的持续向好发展有赖于合适的专业结构。在总体方向上，要“坚持把社会需求作为学科专业设置和调整的重要因素，把落实国家标准作为学科建设的底线要求，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学科专业布局”。具体到新文科的专业结构调整来看，既要完成整体提高，也要实现特色发展。

对于当前新文科的整体发展，需要加快完善支持新文科发展的各个学科专业，打造中国特色的文科学科体系。这既需要对旧有的学科专业进行调整和完善，也需要根据社会需求积极发展新兴交叉学科，打破学科壁垒，促进文科内部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以及促进文科和理工农医科的交叉融合。在根据当前需要调整结构时，也要考虑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的需求，要使结构具有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性，是可进行动态调整的。此外，要考虑高等教育的分类发展，在实际改革中充分考虑不同学校的不同特色，因地制宜地为发展新文科打造特色专业，譬如师范大学就要发展教师特色，拓宽与培养不同学科学生的教育视野和教育情怀，使各个专业的学生都能成为社会道德、价值、知识的引领者。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并不是要形成一劳永逸的结构布局，更重要的是要在调整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一种灵活的机制，以支持新文科的持续发展。



**第二，调整评价体系。**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要在新文科建设中调整文科的办学导向，就必然要先改革文科的评价体系。当前的文科评价体系改革需要着力克服两个方面的矛盾：一是短期利益追求和长期持续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是以数据为本的计量式评价与文科价值的不可量化之间的矛盾。

短期利益追求与长期持续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现代的教育评价“可以在短期内快速满足决策者的任务性指标，却往往阻碍原创性、顶尖研究成果的产出和‘卡脖子’技术的突破，是一种超强功利化的短期主义‘教育性’”。文科有着不同于理工科的特性，相比于理工科，文科的思想成果对知识积累和阅历积累的要求更高，因而思想的顿悟、理论的产出往往需要更长时间来积淀。现有的评价体系对人的短期成果要求越来越高，不少高校更是对青年教师提出了非升即走的严苛要求，这不利于文科研究者的持续发展。过分看重短期成果的评价体系，无法引导树立终身学习的人才成长观。文科评价体系的改革要考虑到文科人才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到重要理论的突破需要时间的酝酿，要注重过程性评价。

以数据为本的计量式评价和文科价值的不可量化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当前的评价主要是以定量指标来评价一切，诸如论文发表数量、论文引用率、课题数量等，但是文科内容的思想性、教育性并不能简单以数量来衡量。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要“改进学科评估，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淡化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奖项数等数量指标，突出学科特色、质量和贡献”。文科的评价体系应该根据文科的特色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以引导高校文科研究者做出有深度、有突破性的研究。

**第三，重建知识体系。**中国现有的知识体系主要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与我国传统知识体系不同。虽然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但是过分依赖西方的知识体系既不利于人们理解和发展中国的传统知识、文化，也不利

于认识和解释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某种程度而言，正是西方知识体系限制了中国理论创新的视野，所以新文科要担负起发展中国文化的责任，就要重建中国的知识体系。当前对西方知识体系依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依赖。文科的研究对本土话语的利用不够，出现了许多用西方概念说明中国文化、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象的情况。西方概念的产生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做支撑，并不能直接用于理解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化。即便是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现象，也需要发展概念，对概念进行本土化调整，如此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的独特问题。所以最能解释中国现象的还是本土概念、本土理论。

要对现有的知识体系进行深刻反思，打破它、重建它，还需要广泛了解世界各个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以及传统的知识体系。既要从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中寻求灵感，也要从世界其他文明中汲取精华，通过理解不同文化与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来思考、建立一个更加包容的新知识体系，解放学者思想，为理论创新提供更多方向。杨灿明指出“我们的文科一定要是知道走过的路，知道现在所处的方位，并明了下一步前进方向的新文科”，他提到现在法学言必称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我们能否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中总结升华出中国自己的法系；一个五千年不断的文明，如果没有法，这是不可想象的”。当前我们对自身传统的知识体系研究得还不够深入，遑论其他知识体系了。总体而言，重建知识体系是一个大工程，需要各个专业分头并进，既要分类研究也要打破学科壁垒进行综合研究。

### （三）输出成果，潜移默化影响世界

当前国际上的话语权主要还是被西方强国所把持，主流价值观也主要来自西方世界。西方声称的所谓“自由”“民主”，即使在全球疫情背景下，也仍有极多的受众。中国要提高国际话语权，用中国文化、中国价值影响世界，还需要高校文科专业积极推进跨文化交流，用世界人民看得懂的方式输出中国的理论研究成果和蕴含中国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等。推进跨文化交流可以从两个方向着手：一是输出体现中国价值的优秀文化成果，以宣传中国的价值优越性；二是输出批判西方价值的优秀文化成果，以解构西方价值。前者更为受到当前国内学者的关注，

但是力度仍然不够。我们有许多优秀的本土理论创新，譬如叶澜教授基于自身多年的基础教育实践提出的“生命·实践”教育理论，王道俊教授等人提出的“主体教育理论”，李吉林老师提出的“情景教育理论”等。这些都是基于中国教育实践形成的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但是这些国内的创新理论，还需要进一步走向世界、影响世界。我们有很多展示中国灿烂文明和核心价值观的文学艺术作品，它们也还没有走出去，反而是一些批判国内问题的、解构国内主流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因为迎合了西方世界的“有色眼镜”而在国际上受到鼓吹和赞美。宣传中国价值，要积极到国外参加交流，更要发挥国内的主场优势，在国内打造有影响力的国际论坛、国际奖台、国际展台。邀请国际人士来参加，并向他们展示我们的优秀文化成果。

就解构西方价值而言，高校文科研究者要勇于挑战西方话语权，既要从学术的角度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西方的知识理论，也要从现实活动的角度犀利地指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乌合麒麟之画就是解构西方价值，拆穿部分西方国家虚伪面孔的一种典型。而乌合麒麟之画所引发的社会争议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一直有不少国人包括部分高校知识分子无视西方偏见的存在，言必称西方价值，即便是西方价值已经不能对其自身行为自圆其说也不加以反思。部分文科研究者对西方文明的仰视不利于批判性成果的产出和输出。高校新文科建设要积极改变文科研究者面对西方学术成果的心态，打造平等的对外交流平台，推动我国文科研究者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平等对话。不能为了让西方世界接受我们的成果，就去迎合西方强国的价值观。文科研究者要始终守住中国立场，在国际交流中，敢于输出高质量批判性文化成果。如果不能从正面战场突破，让西方世界坦然承认中国价值，那就要通过解构西方价值，为传播中国价值打开空间。

### 三、新文科建设的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处于崛起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言：生活决定意识。人们对国家的认知与态度受到人们生活状态的影响。这个

时代的孩子出生在一个民族富强的时代，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就对国家充满了信心和自豪感。因此，新文科的建设有民心所向的力量支持。在这个时代，经济飞速发展为我国各方面实力提升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军事实力、外交实力的增强又为国内环境的稳定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这意味着，当前新文科的发展有良好的环境、充分的条件。这样的发展成绩，说明有很多中国实践可以研究，有很多中国故事值得讲述，有很多中国画面值得定格，新文科的建设有丰富的原材料。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国际格局变幻莫测，中国要获得同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还需要应对许多挑战。新文科的建设必须发挥作用，助力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扩大优势，取得胜利。新文科建设有必须实现突破的意志作为支撑和动力。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在谈到世界格局之变时指出，各国应对疫情的表现与中国的差距，给了中国新的历史机遇，中国“在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各方面空前地大有作为，不仅必需，而且可行”。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新文科建设是可行的，更是可期待的。人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新文科建设将在学科体系构建、人才培养、学术发展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首先，新文科所构建的文科学科体系，将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动态的学科体系，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在新文科建设的进程中，各个文科学科将积极完成转变，通过调整专业结构、改革课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理论，形成新的学科体系。新文科中各个学科体系彼此间各具特色但又有充分的沟通和融合。这样的学科体系，构成了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是培养优秀文科人才、酝酿创新性文科研究的基础。在新文科的学科体系下，学生能接受符合时代需要、国家需要、个人需要的文科教育和学术训练，而教师、研究者能有更好的条件开展本土学术研究和更方便的平台进行学术交流和跨学科合作。

其次，新文科所培养的时代人才，将能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为人民代言、为中国代言。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中国区别于西方国家最突出的特点。未来新文科课程中会有越来越多与当代本土实践相关的内容，无论是扶贫工作还是基建工作，从中皆可以看到党和国家是如何以人民为中心部署工作的，也可以看到千千万万伟大的中华儿女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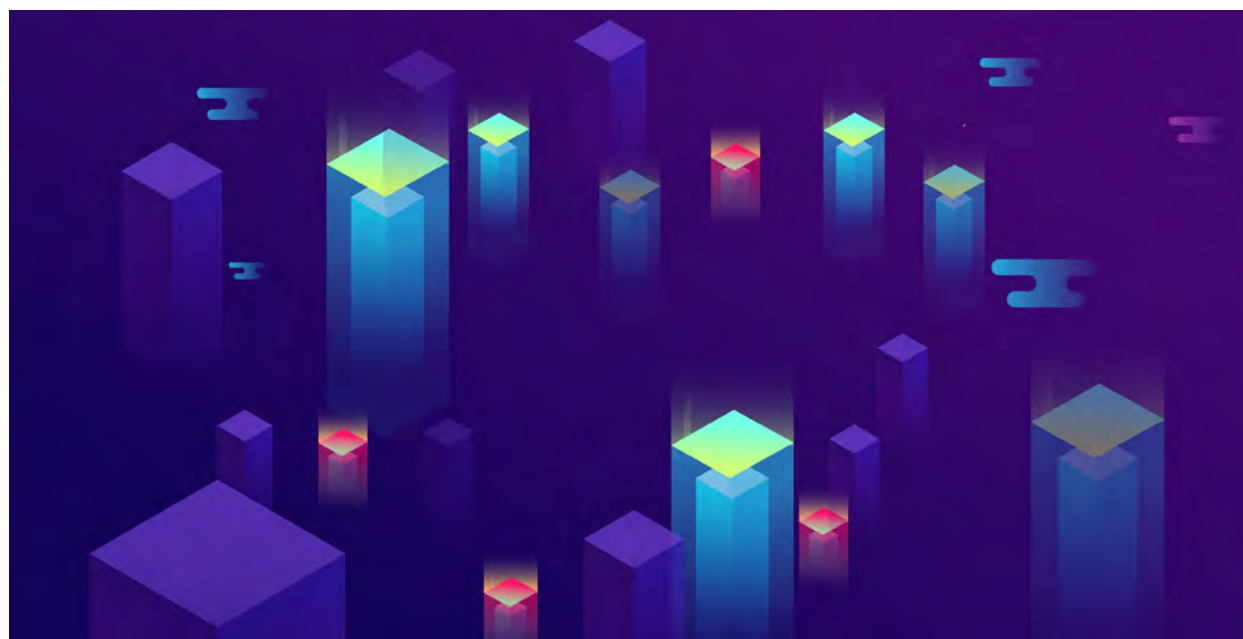
做出的伟大贡献。此外，未来新文科教育会更加重视对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连续性的呈现，而学生越是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就越能认同中国价值，相信人民的力量，形成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受了新文科教育的中国人才，会把人民放在心里，会关注人民关注的问题，在人民的生活中做研究，为人民发声。疫情期间全球各国的表现已经让许多国人亲身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样的心态基础上，通过加强新文科建设，进一步以文化人，一定能培养出更多中国立场、人民立场的时代新人。

再次，新文科所创新的知识体系和思想理论将解构完全由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形成一个更为客观真实、平衡反映东西方主张的新体系。通过建设新文科，中国学者解放思想，看到多元的文明与知识体系，将逐渐突破由西方主导的学术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极具包容性的新知识体系。基于此，中国学者扎根本土，用中国话语回答中国问题，用中国概念解释中国现象，形成中国理论，并在国际上与各国学者展开平等对话。通过建设新文科，中国学术实力增强，学术话语权提高，将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渐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使国际学术界无法忽视中国学术界的理论创新、思想突破，以更加尊重的姿态来聆听中国学者的声音，理解中国文化，认识新的知识体系。中国的理论未来还将为世界的和平、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最后，新文科所传播的中国价值将在世界上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就像西方各国崛起以后，西方价值影响整个世界一样，中国的崛起也必然带来中国价值的传播。通过新文科的建设，中国的文科整体实力提高，中国文科推进平等国际对话的信心和能力也随之增强。中国的新文科人才，走向各个工作岗位，通过各种方式，诸如学术作品、影视作品、音乐、画作、游戏等，展示各种各样充满魅力的中国形象，输出中国理论、中国文化、中国价值。通过建设新文科，人们将在各个文科专业领域与西方国家对话、对垒，逐渐改变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价值的世界影响力。世界将接受中国的影响，因为中国的发展理念始终与世界人民的长久利益相一致。

总体而言，中国新文科的前景是可期待的，这与中国发展的大势紧密相关，

但是也要认识到中国新文科建设必将是一场充满挑战的持久战。当前，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仍然还在发生作用，美国霸权对中国的压制仍将长期存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梦孜就认为短期内国际力量格局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仍将面临一个西方理论（包括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影响力等）在较长时期内占优或惯性延续更长的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特别要正视中美可能渐行渐远而非日益走近的双边关系，坚持底线思维，作最坏的准备”。中国文化要真正走出去影响世界，必然还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只要我们做好内部的新文科建设，无论世界格局发生怎样的变化，新文科都能支撑中国应对这样的变化；只要我们能够培养出中国立场的时代人才，代表中国未来的年轻人就能够推动中国的持续发展；只要我们能够扎根本土创新理论，这些理论就有机会突破西方文化霸权的阻碍走出中国影响世界。



钟秉林

## 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写在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颁布之际

来源 | 《教育研究》2022 年第 9 期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钟秉林

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出通知(学位〔2022〕15号),正式颁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以下简称《学科专业目录》)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目录管理办法》),2023年下半年启动的研究生招生工作将按照新版目录正式执行;另外,首次研制的《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以下简称《学科专业清单》)和《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清单管理办法》)将另行下发,并依现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做好实施工作。这标志着历时一年多的新一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终于落下帷幕。可以预期,《学科专业目录》的颁布,将对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 一、本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的背景和意义

目前使用的 2011 年版学科专业目录已逾十年。十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高等教育发展形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 （一）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的宏观背景

高层次创新人才成为全球科技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促进科技与教育相结合已经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

#### 1. 国际格局重构提出新挑战

21 世纪以来，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国际格局朝着多极化的趋势发展，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争夺生存权、发展权和话语权的焦点与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依然面临自然科学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现象，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范围内的话语权等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国际格局重构的背景下，面临西方国家强行推进的科技“脱钩”等策略，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这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高等学校要加强基础学科的创新应用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为技术、组织、模式的创新提供方向指引和基础支撑，为增强高等教育国际话语权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 2. 国家战略布局调整赋予新使命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在对国内外环境变化进行科学研判的基础上，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也为我国高等教育赋予了新的责任内涵与时代使命。当前，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放缓，国内周期性问题与结构性矛盾叠加，尤其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越来越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新技术、新产业、新职业不断涌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对高层次专门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需求越来越迫切。我国高等教育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开拓适应新发展格局的新局面，提升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这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

### 3. 高等教育发展面临新任务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任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在2019年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诉求已从寻求规模扩张、满足入学机会需求，转向激发高等教育的创新驱动势能、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满足人的多样化高等教育需求等方面。同时，随着信息技术融入教育教学，知识生产和传播模式向多元转变，正在颠覆着传统的学习过程，导致高校的教师角色转型、师生关系变化，教育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教学组织形态和教学管理机制等面临一系列冲击。学科发展综合化已成为主要趋势，对高校学术资源、科研资源和教学资源的优化整合，以及学科专业结构和学术治理体系改革提出新要求。高等学校要主动应对新的挑战，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优化内部学术治理结构，提高学科专业建设水平，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实现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在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进程中作出新贡献。

#### （二）学科专业目录修订的重要意义

按照国内外通行的理解，从本质上而言，学科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专业是广义的课程组合。学科和专业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础平台和立德树人的重要载

体，从而成为现代大学的核心支柱，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全局性作用。

首先，学科专业目录对于高层次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是高等学校招生录取、人才培养、学位授予和就业指导的重要依据；其次，学科专业目录对于学科专业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是高等学校构建学科专业体系、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制定和实施学科专业建设规划的重要依据；第三，学科专业目录对于高等学校内部学术治理体系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是高等学校设置和调整二级学院（学部）以及科研院所的重要依据；第四，学科专业目录对于政府宏观管理和分类指导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是教育统计分析、学科评估、专业认证、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和办学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

现行学科专业目录是在 2011 年颁布的，在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优化和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学科专业建设与学术治理体系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间的延续，教育内外部形势发生了变化，现行学科专业目录及其管理机制也逐渐暴露出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一些问题。比如，修订周期过长，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回应不够及时；专业学位在目录中的地位不够凸显，类别、层次还需完善，交叉学科还需稳步发展；学科专业设置存在固化、细化等倾向，不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和复合型人才培养；学科专业内涵需要更新等。因此，顺应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大趋势，遵循人才培养基本规律，针对现实问题，适时修订学科专业目录，创新目录管理机制，对于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和推进高等学校内涵式发展，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 二、本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的思路 and 原则

为主动应对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挑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审时度势，提出了“目录与清单并行、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并重、放权与规范并进”的改革思路，并确定了本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的基本原则。

### （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本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强调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迫

切需求，立足国家重大需求，围绕科技前沿和“卡脖子”关键领域、国家发展薄弱点等所涉及的学科专业，与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紧密衔接，有针对性地对学科专业进行设置调整，满足国家和社会对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为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迅速回应国家急需领域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还首次研制了《学科专业清单》及《清单管理办法》。

## （二）尊重学科专业设置基本规律

本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强调要遵循学科专业设置的基本规律，根据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的属性，在研究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以及师资、课程、教材、评价等培养要素的差异性的基础上，分类确定设置原则。在一级学科设置方面，顺应学科发展综合化趋势，坚持宜宽不宜窄的原则，突出宽口径与适应性，以利于夯实学生的学科基础、拓宽知识面、优化知识结构，增强学生工作后尽快适应教学工作、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基础能力和发展潜力。在专业学位类别设置方面，突出精准性和灵活性，以利于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和科学研究与实践应用能力，增强学生毕业后在实务部门工作的职业胜任力。

## （三）构建面向未来的学科专业建设机制

本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的重点不是学科专业数量的简单增加或减少，其核心是创新学科专业的组织与建设方式，深化学科专业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探索构建面向未来的学科专业建设管理新机制，提升研究生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和快速响应能力，为打造需求牵引的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更加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学科专业平台支撑和高层次创新人才供给。

## （四）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

学科专业建设需要长期积累，人才培养周期较长，学科专业目录亦应保持相对稳定性和前瞻性。本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采取了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循序渐进、重点突破的工作方式。

第一，修订程序严谨。《学科专业目录》修订过程包括：一是系统梳理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署要求、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两会代表、学位授予单位、科研机构 and 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二是组织召开工作部署会，启动目录修订工作；三是成立7个学科领域专家论证组，对各方提出的近270个学科专业设置建议进行深入论证，分领域提出目录调整建议方案；四是组织跨领域专家研究论证，形成目录征求意见稿，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五是教育部专题研究，提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审议咨询；六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通过。

第二，发扬学术民主。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统计，在历时一年多的目录修订过程中，累计召开论证会300余次，参与专家近3400人次；召开专家座谈会10余场，听取100余位专家意见；书面征求有关部门、地方、“双一流”建设高校等近200家单位意见。《学科专业清单》的编制也经过了严格的程序，从而保证了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的科学性与公正性。可以说，本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取得的成果，是教育界、科技界和学术界共同努力的结晶；同时，也为最终实现编制统计性学科专业目录的改革目标做出了探索，积累了经验。

### 三、本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的主要特征

新版《学科专业目录》设有14个门类，下设一级学科117个，比2011版目录增加4个。专业学位类别67个，比2011版目录增加17个；其中，博士专业学位类别36个，比2011版目录增加18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31个。与2011年版学科专业目录相比，本轮修订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 （一）《学科专业目录》与《学科专业清单》并行，创新学科专业建设模式

本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面临新的现实问题，一是随着知识创新加速和产业转型升级，行业产业部门的许多重大人才需求，如区块链、隐身技术等专门人才，具有急迫性和阶段性特征，而这些问题导向型的学科专业还达不到编入规范性目录的条件要求，需要探寻新的学科专业建设路径，引导高校发挥特色优势进行探

索和孕育；二是一些特色、冷门学科专业，如古文字学、中华早期文明等，虽然就业面不宽且社会需求量不大，但对国家发展非常重要，需要建立有效的扶持机制，引导高校重视这些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

本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负责，采取顶层规划的方式组织专家编制了《学科专业清单》，并将其定位为引导性学科专业目录，作为规范性《学科专业目录》的重要补充，共同构成中国特色学科专业建设指南。《学科专业目录》突出规范性、普遍性和成熟度，每5年修订一次，以学界业界的共识为基础；《学科专业清单》突出灵活性、动态性和创新性，强调服务国家重点发展领域和重大需求，不拘泥于一级学科甚至二级学科，口径可宽可窄，不追求系统性和完备性，以问题导向型的规范性目录外学科专业为主，兼顾国家急需的目录内学科专业，重在快速响应社会需求，定期集中编制，每年动态调整。这是推进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国家急需学科专业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创新学科专业建设模式、加快培养国家急需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探索。

## （二）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并重，推进分类培养和分类发展

专业学位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为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不同类型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多样化诉求而设立的一种学位类型，自设立以来培养出了大批国家急需的高层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但与学术学位相比，我国专业学位发展的历史较短，在人才培养规格、课程体系、培养方式、导师队伍、管理机制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短板，培养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社会及用人单位的认可度有待增强，亟需不断探索和完善。

本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遵循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并重的原则，改变了过去将专业学位类别目录作为学科专业目录附表的呈现方式，将主要知识基础相近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统筹归入相应学科门类，实现了“并表”呈现，并用不同的编码加以标识，以凸显两类人才、两种学位同等重要。专业学位人才培养得到高度重视，新设了气象、医学技术、文物等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和应用伦理、数字经济、知识产权、国际事务、博物馆、食品与营养、针灸、密码等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并将法律、社会工作、体育、国际中文教育、应用心理、翻译、出版、风景园林、农业、林业、公共卫生、药学、会计、审计等专业学位类别升格到博士层次。这既有利于高等学校组织和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和培养，满足社会对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分类培养和分类发展；亦有利于用人单位选人用人，促进公众对专业学位的了解，提高专业学位的社会认可度。

### （三）瞄准科技前沿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学科专业平台支撑能力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文化发展趋势，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是本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着力研究和探索的重要问题。比如，为主动回应科技前沿发展和关键领域需求，新设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智能科学与技术等一级学科或交叉学科；为更好服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设中共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法医学、区域国别学等一级学科或交叉学科；为加强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科专业支撑，重点对艺术学门类下设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设置进行了调整完善，设置艺术学（含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设计等历史、理论和评论研究）1个一级学科，以及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设计等6个专业学位类别，在推动分类培养、分类发展的改革探索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另外，考虑到内涵和外延的发展及变化，对部分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进行了更名。例如，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将“汉语国际教育”，更名为“国际中文教育”，等等。

为积极回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行业产业转型升级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急迫诉求，《学科专业目录》在所有14个学科门类下都设置了专业学位，增设了一批专业学位类别。比如，在哲学门类下增设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学位类别，在理学门类下增设气象专业博士学位类别，在交叉学科门类下增设文物、密码2个专业学位类别等。同时，面向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和服务经济主战场，在《学科专业清单》中也列出了一批引导性学科专业。

### （四）为知识融合与交叉学科发展搭建平台，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从学科发展的趋势来看，一方面高度分离，另一方面又高度融合，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和融合趋势明显。为顺应学科发展综合化的趋势，服务国家对

于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需求。202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增设了交叉学科门类，下设国家安全学、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2个一级学科。在本轮专业目录修订中又增设了设计学、遥感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纳米科学与工程、区域国别学5个一级学科，以及文物、密码2个专业学位类别，鼓励和引导高等学校发挥学科综合优势，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必须强调指出，要厘清“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之间的逻辑关系。学科是人类对知识体系的划分，学科细化在带来科学研究更加深入的同时，也有可能陷入局部视角和单向思维。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个体本身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因而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所形成的科学知识体系也具有整体化的特征。一方面，随着科技发展和产业革命的不断加速，单一学科的知识、方法等已不足以破解重大科学难题。“学科交叉”是学术思想交融、系统辩证思维和研究范式变革的体现，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多学科交叉与多技术融合日益成为解决人类发展重大难题的研究范式。学科交叉点往往就是新学科的生长点，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有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复杂科学问题、社会问题和全球性问题，并不断催生新学科前沿、新科技领域和新产业形态。因此，“学科交叉”成为学科内涵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学科发展的路径和水平。比如，教育教学与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的融合，正在重构教育学学科的概念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制造技术与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的融合，使得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等学科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交叉学科”是综合化、跨学科的产物，与“学科交叉”既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也有显著的差异性。学科作为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应该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清晰的知识分类和学科边界，具有相对独立的概念体系、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相对比较成熟，并且形成学界共识。这是学科（包括交叉学科）纳入规范性目录的基本条件，也是高校开展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设置二级院系（学部）及研究院所的重要依据之一。

#### （五）改革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

科学的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是保证人才培养与学位授予质量、推进高校学科建设和治理体系改革的制度性保障。本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本着放权与规

范并进的原则，制定出台了《目录管理办法》，明确了学科专业体系及目录功能和适用范围，重点在建立放管结合的设置管理机制、规范目录设置和调整程序、缩短目录调整周期、建立调整退出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在进一步下放学位授予单位学科专业设置自主权，明确各单位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的规范程序，加强对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的质量监管等方面，也在总结试点探索经验的基础上作出明确规定。

第一，统筹学术学位目录与专业学位目录设置与管理。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体系分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与专业学位类别、二级学科与专业领域，使得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处于同等级地位，统筹规范设置、调整与管理。第二，建立学科专业目录放管结合的设置机制。坚持质量为本，高起点设置，高标准培育，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设置采取先探索试点、成熟后再进目录的机制，学位授权自主审核高校按程序自主开展试点设置工作，国家也可以根据国家重大需求组织开展试点设置工作，试点设置达到条件要求的可按程序编入目录。第三，规范各级目录的设置和调整程序。对于学科门类的设置与调整，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的命名规则、编码规则、设置条件、设置程序、编入目录等作出明确规定。第四，缩短各级目录调整周期。将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目录的修订周期缩短为5年；二级学科和专业领域目录每3年统计编制一次；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和专业领域每年定期统计发布；《学科专业清单》每年动态调整，重在快速响应社会需求。第五，建立调整退出机制。规定了学科门类的调整程序、试点设置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的撤销程序、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退出目录的工作程序和要求。第六，构建学科专业质量保障体系。试点设置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必须参加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或核验。为保证学科专业建设质量，对学位授予单位、学科评议组、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等也分别提出了明确要求。

同时，对《学科专业清单》中目录外学科专业的设置、招生、培养、学位授予和建设成效考核等，《清单管理办法》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引导高校依自身权限和学科专业特色优势，积极服务行业产业急需，采取依规自主设置并备案的方式进行建设。



## 四、高等学校要抓住机遇推进高质量发展

《学科专业目录》和《目录管理办法》的正式颁布，以及《学科专业清单》和《清单管理办法》的实施，对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内部治理体系改革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and 新的机遇，高等学校要不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扎实推进学校的内涵式发展、特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 （一）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完善学科专业建设规划

学科是系统性的知识体系，从本质上而言，学科建设就是知识的传承、保护和创造的过程，是知识体系的构建、维护和更新的过程。高水平的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及技术研发是学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学校办学实力及学术声誉的重要载体。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先进理念、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如体制机制创新、治理结构优化、教师队伍建设、培养模式改革、科技成果转化、国际交流合作等，可以为学校整体发展提供借鉴和示范，为优化学术生态和育人氛围创造条件。高等学校要抓住机遇，结合学校“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实施，依据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和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调整和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搭建学科专业平台和基地，为提高知识贡献度和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平台，本质上是包括实践性课程在内的广义的课程组合。研究生课程体系和知识结构的构建、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创新创业精神和综合素质的养成，都需要以知识作为基础，以知识体系作为支撑。因此，从高校人才培养的视角而言，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是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和相互耦合的统一体，学科与专业要进行一体化建设。一方面，高等学校要结合人才培养工作完善学科专业建设规划，加强专业建设和改革，通过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教师的教学与科研能力和水平；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要反哺教学，重视将学科和科研资源有效地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课程与教材的新内容、开出新的教学实验、提供研究生论文选题、支撑一流专业和特色专业建设等，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创造优良条件。另一方面，专业建设与发展为学科建设提供了优质的人力资源支撑和学科专业分化与融合的可能

性；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项目，从事学位论文研究，既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也为学校的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提供了生力军。

## （二）优化学术治理结构，创新管理体制机制

优化高校内部学术治理结构，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教学管理和学术治理效能，是提高学科建设水平、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的重要保障。

第一，调整和优化学术治理结构。院系（学部）和科研院所是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基础性支撑平台，要以《学科专业目录》为依据，遵循学科发展逻辑和人才成长规律，稳妥调整院系所设置。从国际国内经验来看，大学的学院（学部）设置调整应主要遵循学科逻辑和宜宽不宜窄的原则，可以按一级学科组建，也可以按一级学科群或学科门类组建，以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与协同创新，增强院系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按照强化办学特色和“少而精”的原则，在顶层设计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亦可以设置若干以二级学科、二级学科群或交叉学科为基础，或是面向经济社会领域重大现实问题的学院或科研院所，增强跟踪世界科技前沿和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在院系所调整和建设过程中要重视体制机制创新，比如，在学部制改革中要避免“虚化”，坚持实质性整合，减少管理层级，以改善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效率。第二，搭建交叉学科和急需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平台。交叉学科门类及其一级学科与专业学位类别的设置和《学科专业清单》的颁布，为高校发挥学科特色优势，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提供了指南，要探索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和协同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新机制，通过政策导向、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手段，打破院系所内部利益格局，整合相关学科专业的优势资源，充分发挥资源使用效益；要加强科教融合与产学合作，创新学科建设和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为研究生培养提供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保障。

## （三）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高层次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基本功能和重要使命，也是学科专业建设的重要内涵和成效产出。高校要抓住《学科专业目录》和《目录管理办法》正式颁布

的机会，认真研判研究生培养面临的来自于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和国际化发展的大形势，坚持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的发展主线，探索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

首先，优化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厘清学术型和应用型学位的内涵及其差异性，分类确定研究生培养目标，并从研究生的职业理想养成，知识、能力、素质结构设计，毕业后面向的特定的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等方面，明晰研究生的培养规格，实现分类培养。其次，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瞄准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优化研究生知识结构，拓宽知识面，夯实学科专业基础，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奠定基础。第三，重视能力培养和素质养成。加强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探索校企合作和产学研结合新路径和新机制，培养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创业精神和综合素质。第四，改革培养方式与方法手段。主动应对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带来的教师角色转型、师生关系变化的新挑战，从教育教学观念、教学与学习方式、教学组织形态和教学管理机制等方面深化改革；突破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引导和组织研究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式学习。第五，抓好导师队伍建设。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完善聘任考核和职称评聘等制度建设，优化导师队伍的年龄、学科和学缘结构，提高导师的专业发展能力和育人能力，为研究生培养提供高素质的师资保障。第六，加强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践行学生中心、结果导向、持续改进、多元参与的现代评价理念，优化质量标准、指标体系和评价方式，健全持续改进工作机制、组织机制和相关制度，构建和完善科学有效的研究生学习效果跟踪评价机制和教育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

张志勇

## 有什么样的中考，就有什么样的 义务教育样态

来源 | 《光明日报》2022年07月05日14版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张志勇

有什么样的中考，就有什么样的义务教育样态。2022年中考是检验义务教育“双减”成效的一次“大考”，对巩固深化“双减”工作将产生重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以考试招生改革牵引教育综合改革。深化“双减”工作，必须紧紧抓住中考改革这个牛鼻子，大力推进中考命题改革，全面提高中考命题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水平，引导义务教育学校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为深化“双减”创造良好教育生态。

###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坚持“学考内容一致”

考试命题对义务教育学校课程开设和学生学习方式具有重要引导作用。要发

挥中考命题对中小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的重要牵引作用，就必须在考试命题内容覆盖范围上坚持“学考一致”。

坚持“学考一致”，即中考考试内容和学生学习内容相一致，做到“考什么与学什么相统一”。具体而言，一是各地要将国家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案所设定的除综合实践活动外的全部科目纳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促进学生认真学好每门课程，完成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学业，引导学校全面开齐国家课程，促进学生打牢全面发展的共同基础；二是各学科中考试卷要立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彰显新时代特征、反映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融入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课程内容，考查各学科综合学习在学生核心素养形成中的效果，引导学校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三是探索跨学科综合命题。中考试卷命题以学科知识综合运用为依托，体现跨学科思维，用多学科跨学科知识解决问题，以此引领中小学开展跨学科学习和主题学习。

### 依据课程标准命题，坚持“学考水平一致”

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是义务教育学校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体现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培养要求。中考改革要求取消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大纲，严格依据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命题，这是近年来中考命题改革的重要原则要求。依据课程标准命题，在中考命题中坚持“学考水平一致”，做到“学生学业学习水平与考试难度相统一”，即中考试题命题的知识范围和学业测试难度水平要与学生学习的课程内容和课程修习后应达到的学业质量标准相一致。其具体内涵包括：一是各地中考学科命题内容要认真落实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严禁超标命题和随意扩大、压减考试内容范围。二是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主要衡量学生达到国家课程规定学习要求的程度，兼顾学生毕业和升学需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结合实际，对各学科考试时长、容量、难度等提出规范要求，严禁将高中课程内容、学科竞赛试题以及校外培训内容纳入考试内容。三是确保依据课程标准命题，就是要依

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规定的学生应达到的学业质量水平命题。所谓科学合理设置试卷难度，关键是中考命题要坚决对标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对学生学业质量应达到的难度水平要求，把学生学业合格水平作为试题难度命制的基准，即绝大多数学生达到合格水平。要确保中考试题能够科学评测学生达到各学科学业质量的水平，而不是简单迎合学生能达到的学习水平。这样既能够防止试卷过难增加学生负担，也能够避免试卷偏易降低区分度，影响中考招生选拔。中考命题坚持学考难度水平一致，要求义务教育各学科日常教学必须严格贯彻国家课程方案，让学生达到各学科学业质量标准。

### 引导学习方式变革，坚持“学考方式一致”

过去中考命题长期强调“知识立意”，试题主要关注对学生知识掌握水平的考查，这种命题方式直接把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引向机械记忆和题海训练。这说明，学生应对中考试题的解题方式背后的思维方式，会直接影响师生日常的教学方式。要发挥中考改革助推“双减”的重要作用，必须坚持“学考方式一致”，做到“学生日常怎么学与中考怎么考相统一”，即学生考试解题时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与学生日常学习时运用的思维方式相一致。

中考命题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坚持素养和能力立意的命题导向，立足于考查各学科核心素养，从注重考查知识回忆和简单运用，到更加注重考查学生思维过程、创新意识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减少单纯记忆、机械训练性质的试题，增加探究性、开放性、综合性试题，把考查的重点放在学生的思维和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中考命题的这一改革要求，体现了对中小学日常教学方式变革的内在要求。中考命题从“知识立意”向“素养立意”转型，必将引领中小学教育教学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即从大量记忆、理解和简单运用的低阶学习，向综合、创新、评价的高阶学习转型，由此中考命题将发挥“引导教师积极探索基于情境、问题导向、深度思维、高度参与的教育教学模式，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积极作用。

## 注重学生综合素养考查，坚持“学考目标一致”

中考命题要求“注重加强对学生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品德修养、知识见识、奋斗精神、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查”，而学生的综合素养是在具体任务情境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中考命题改革特别要求拓宽试题材料选择范围，丰富材料类型，充分考虑城乡学生学习和生活实际，增强情境创设的真实性、典型性和适切性，提高试题情境设计水平。

义务教育课程改革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注学科核心素养教育，这与中考命题改革“提高试题情境设计水平”的要求具有内在一致性，体现了中考与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学考目标一致”的原则，即做到“学生学习情境与考试命题情境相统一”。从本质上说，中考试题的依托情境不再是过去学生学科知识学习时单一的“课堂学习情境”，而是更多地回归到问题真实发生的社会生活情境。这一命题要求，对学校教育、学科学习的开放性，以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协同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义务教育课程教学要回归实践、回归生活。



张 炜

## 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基于教师教育现代化“CSS”框架的路径分析

来源 | 《长江教育论丛》(2021 年第一辑)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院副院长 湖北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江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 张炜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高校的评价基点，其中第八条明确提出“改进师范院校评价，把办好师范教育作为第一职责，将培养合格教师作为主要考核指标”。10月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导向和重点要求。对此，陈宝生部长撰文指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必然要求，是建构新发展格局的基础环节，是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的关键举措；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要在深化改革促进公平上迈开新步，要对标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



## 一、以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引领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根据新发展理念以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基本精神，“高质量教育体系”是能够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能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需求，更加多元、更有效率、体系更加完备、更可持续发展、更为安全可靠的教育体系。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描绘了美好的蓝图，为迈向教育发展新征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于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重大意义。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首先需要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的必要条件。

当下，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面向建设教育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的必要性主要体现为：

一方面，教师是教育事业的第一资源，教师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2020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强调，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教师是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资源，是学校教育串联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成为新时代“大教育”的主导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培养培训教师的教师教育是全部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其在新时代教育现代化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现实价值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另一方面，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是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先手棋，是推动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意见》提出“经过5年左右努力，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基本健全，职业发展通道比较畅通……教师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教师队伍规模、结构、素质能力基本满足各级各类教育发展需要”。2018年3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计划》），提出了十项教师教育改革行动，回应了《意见》的目标精神。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重点部署了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其中第七项战略任务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

队伍。从新时代国家教育发展重要文件的印发时间及其内在逻辑不难看出，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是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战略先手；教师教育现代化既是建设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内涵组成，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内在保障和推动力量。

## 二、教师教育现代化的“CSS”分析框架

### （一）教师教育现代化

2018年以来，随着《意见》《计划》等党中央和国家重大教师教育政策的出台，教师和教师教育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教师是学校教育乃至教育事业的第一资源的社会观念不断被夯实，教师被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筑梦人，教师教育则被确立为教育工作的母机和提升教育质量的动力源泉。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的当下，教师教育在教育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中的地位如此重要，“教师教育现代化”这一重要概念就不能不提。

略显尴尬的是，“教师教育现代化”这个概念在国内辨识度并不高，尤其在学术上鲜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被教育现代化的“光环”所遮蔽；二是由于教师教育学科化尚未整体完成，缺乏自成一体的现代化分析框架。实际上，即使作为教育现代化的下位概念，教师教育现代化概念依然具有相对完整的独特内涵和外延，其分析框架的设计也有据可循。在建设教育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开启之际，提出合理的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尤显意义非凡。

### （二）本研究中的教师教育现代化的“CSS”分析框架

张炜尝试提出了教师教育现代化及其评价的“CSC”框架，即公共治理视域下的教师教育现代化主要涉及核心层（Core Layer，包括核心1. 候选教师 and 核心2. 教师教育者）、支持层（Support Layer，主要包括培养机构教师教育的对内资源投入、管理协调、创新发展等现代化发展保障）、特色层（Characteristic Layer，主要包括培养机构教师教育对外的开放化、协作化、一体化等现代化发展特征）。

站在教师教育生态系统的视角来审视“CSC”框架，研究者认为：特色层相

对于核心层、支持层的现代化建设而言,其特征展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非紧迫性;而原有的支持层设计在办学实践中可以根据教师教育机构运作的空间和权力边界分为内、外两个层级。将支持层与特色层合并,并将其明确划分为内部支持层、外部支持层,就得到了本研究的“CSS”框架(如图1所示):

其一,核心层。教育现代化是指与教育形态的变迁相伴的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和实现的过程——根据当前教育学界对于“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等概念的主流界定,教师教育现代化及其评价的核心只能是教师教育中的“人”,即候选教师和教师教育者。从现代化及其评价的内容和侧重点来看,专业化(不可替代性)发展和现代性(人道性、多样性、理性化、民主性、法治性、生产性、专业性、自主性等)增长成为该层分析维度的不二选择。

其二,内部支持层(Inner-Support Layer)。核心层中的候选教师和教师教育者的专业化发展、现代性增长离不开教师教育机构的培养培训支持。倘若将核心层作为教师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根本目标,那么内部支持层就是支撑这一目标落地实现的直接途径和主要方法。内部支持层现代化及其评价的内容和侧重点主要有:教师教育者的甄选和培训,教师教育课程的设置和优化,教师教育专项训练与实践的场地和设备,教师教育的文化(间接治理)与管理(直接治理)保障等。

其三,外部支持层(Outer-Support Layer)。核心层中的候选教师和教师教育者的专业化发展、现代性增长也离不开教师教育机构外的政府、学校(用人单位)和社会的相关支持。各级政府主要提供相关政策和经费投入支持,作为用人单位的中小学校则主要为候选教师提供就业岗位和教师入职培训,社会上的新闻媒体和文化机构则主要为教师教育和教师职业提供正确的舆论引导并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

表1 2010年我国非师范院校的师范在校生的基本数据

	A-在校生数			B-机构数(最高培养学历)			A/B	
	本科	专科	中专	本科	专科	中专	本科+专科	中专
综合大学	121 914	22 995	110	7	1	0	18 113.63	—
综合学院	322 560	94 578	716	114	1	0	3 627.29	—
独立学院	75 708	2 279	13 282	30	1	0	2 515.71	—

### （三）基于“CSS”分析框架的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的内涵剖析

教育领域中，何谓质量？已有经典研究，如安心将国内外学者专著对质量的内涵梳理概况为：“不可知论、产品质量观、达成度观、替代观、价值哲学观、外适应观、绩效观、内适应观、准备观。”潘懋元则引用《教育大辞典》中对“教育质量”的解释，指出，教育质量是“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优劣的程度”，这种特征“最终体现在培养对象的质量上”，其衡量的标准是“教育目的和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赵蒙成、周川的研究首先从“质量”的本源——产品质量出发，对其内涵嬗变的常见六种价值属性（独特而优秀、标准规格性、适切度、目标有效性、需要满足程度、实用程度）进行了优缺点分析，并指出高等教育领域的质量具有主观性、历史性、地域性和实践性。综上，可见“质量”这一概念源于对于产品生产的规格和需要/目标达成度的描述，而在教育领域则主要体现在培养条件、培养和管理过程，并最终体现在培养对象上。

在教师教育现代化的“CSS”框架下，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的应有之意包含以下四个维度：其一，候选教师培养的规格和市场需要的达成度高；其二，教师教育者的培训规格和专业发展的达成度高；其三，教师教育机构办学（课程与师资、场地与设备、文化与管理等维度）的规格和国家及地方教师教育目标的达成度高；其四，教师教育外部支持（相关政策、经费投入、就业岗位、舆论引导等维度）的规格及其预期目标的达成度高。

候选教师培养的规格和市场需要的达成度高则具体表现为：教师教育机构立德树人成效显著，候选教师培养的各个环节（从招生、培养到就业、上岗）规范、有效，达到了国家和地方教育部门对该机构人才培养的较高要求；候选教师培养不仅满足了个体的专业发展和就业需求，而且与国家和地方教师教育市场需求紧密对接，其长期的供给实践受到了用人单位的积极评价。

教师教育者的培训规格和专业发展的达成度高则主要表现为：教师教育者职前培养水平能够充分满足其岗位需求；教师教育机构针对教师教育者的入职教育和职后培训能够充分满足其专业发展需求和从事高水平候选教师培养的工作需求。此外，在教师教育机构内部，教师教育者能够围绕新时代高水平中小学教师培养这

一共同目标组建学术共同体，享有较为充分的学术权力；在教师教育机构与实习实践基地之间，教师教育者能够充分驻校开展候选教师的实践指导和一线中小学教师的科研指导和育人协同工作。

教师教育机构办学的规格和国家及地方教师教育目标的达成度高进一步表现为：高水平的教师教育师资供给充分、结构合理、梯队均衡，相关课程和第二课堂活动能够很好支撑人才培养目标的落地；教师教育实践课程和活动的场地及设备能够满足实际需求；教师教育办学理念积淀深厚，教师教育办学文化氛围浓厚；教师教育管理人员队伍建设与时俱进、能够胜任“三位一体”协同育人和“三全育人”的新时代教师教育治理需求。

教师教育外部支持的规格及其预期目标的达成度高则进一步体现为：教师教育学科机制成熟、完善，能够适应和匹配教师教育作为教育工作母机的优先发展地位；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体系得到进一步优化，其教师培养的质量和效能进一步提升，师范教育体系与非师范教育体系协调发展；教师教育相关政策制订科学、及时，政策反馈和调整、优化渠道畅通；各级政府教师教育投入标准制订科学、与时俱进，相关经费投入到位、使用合理；教师教育资格准入机制与就业市场紧密对接，能够有效保障面向基层和一线中小学校的就业岗位充足；全社会尊师重教氛围浓厚，舆论引导及时、正确，全面提高中小学一线教师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国家政策落到实处。

### 三、构建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的路径思考

基于本研究的教师教育现代化分析框架，构建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的路径在于：聚焦补齐核心层的质量短板，同时重点完善内部支持层的支持体系建设，积极优化外部支持层的互动环境。

（一）核心层：构建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必须补齐现有教师教育体系中“人”的短板

#### 1. 采取有效措施，弥补教师教育者培养培训体系的不足

作为教师的教师，教师教育者的高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师教育的高质量。但一直以来，我国教师教育者这一群体的培养培训工作没有得到真正重视。职后教育阶段虽建有全国范围的培养培训机制，但基于实证调查的结果显示：其培训机会分配失衡、培训内容普遍泛化、培训形式空洞单一、培训效能难以保障——教师教育者职后培训的系统性、专业性和标准化水平普遍不能满足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需求；教师教育者职前培养阶段则更为薄弱——没有标准化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几乎没有半年以上的一线实习实践、教法学法研讨等专业实践课程；职前教育对教师教育者日后从事教师教育工作最直接的帮助是打下了一定的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知识基础。

综合我国教师教育者培养培训的现实情况，通常是：教师教育者首先在研究生阶段进行以理论研究为重点的专业学习，部分涉及教育学、心理学相关学科理论知识；毕业应聘到师范专业工作岗位后，在自发地或被动地接受教师教育工作任务的过程中，才开始慢慢意识到自身人才培养能力的不足，开始寻求专业化发展。这样，其培养培训的系统性、实践性、专业性均未能充分体现。我国教师教育者培养培训（职前培养、入职教育、职后培训）质量保障体系的不足严重制约了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的核心层的目标达成。

在我国，教师教育者的培养通常由高水平师范大学或综合型大学的师范专业研究生教育承担。在教师教育学科尚未构建和成熟的前提下，教师教育者的入职教育和职后培训的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从补齐短板的现实难度来看，应当优先加强教师教育者入职教育和职后培训，尤其应当在国家级和省级培训项目中强化对教师教育者的专门培训。因此，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教师教育者的入职教育，加大国家培训项目对教师教育者的覆盖面和专项占比，是弥补我国教师教育者培养培训体系短板的优先对策。此外，作为教师教育者职前教育的师范类专业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也应当逐步进行改革调整，可以在国内“双一流”层次的师范大学和综合大学内部开展试点和探索。在我国教师教育学科体系逐步构建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建立教师教育者职前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并探索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 2. 从深层次、多方位扭转“师范生专业地位和专业认同度不高”的不良倾向

基于对美国教师教育“替代性教师证书方案”(Alternative Teacher Certification Program, ATCP)经验的借鉴和移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发生了根本变革——引入非师范生进入教师资格认证范畴,打破了师范生“培养即认证”的专业特权。虽然这种做法的初衷是为了引入竞争机制以及补充乡村教师供给缺口,但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长期供大于求,近2/3的持证候选教师不能顺利进入一线学校任教),该做法客观上加速了师范生专业地位、专业认同度的下滑趋势,并与教师职业待遇不高、高质量就业难度大、大量低层次低水平培养机构混杂其间等因素共同造成了师范生报考率和教师职业吸引力下降等现实问题,“劣币驱逐良币”的教师教育逆现代化发展问题已现端倪。

教师教育从“以中等教育为主”走向“以高等教育为主”,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是世界潮流——20世纪末中国教师教育改革的大趋势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站在师范生的角度来看,其专业特权从“培养即免费、即就业”降为“培养即认证”直至“培养即竞争、即可能失业或转行”,严重挫伤了师范生的报考积极性,导致师范生生源质量大幅度降低;加上由于教师资格证考试制度某些不合理性安排,导致经过三四年专业培养的师范生可能因考不过“能记会背”“人脉丰厚”的未经专业培养的非师范生而不能进入教职,造成专业人才培养的严重浪费。“这不仅仅是对师范专业学生群体的冲击,更是对师范专业甚至教师教育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根本性否定。”究其原因,中国教师教育的专业发展(不可替代性)不够充分固然是一方面,也与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未能将教师职业真正纳入专业化范畴进行长远设计有关。

因此,必须从更深层次、多维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中国教师资格证考试制度必须从主管者“以师范生(教师)为本”和“教师职业专业化”理念层面上进行深化改革——教师教育和教育部门主管者必须坚定树立“教师职业专业化”“师范院校是教师教育的主体机构”“师范生作为准教师培养的主力军”的现代教师教育理念,一方面,将教师资格证考试通过人数、区域差异与市场需求紧密对接,对专业认证不合格、办学效果不佳、群众反映强烈的低水平教师教育机构进行实质性裁剪;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向同为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学习,

进一步提升非师范生进入教职的专业门槛和培训力度，确保突出师范院校的主力军地位，彰显师范生的教师专业属性和专业（入职、晋升）特权。此外，全社会必须真正地共同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多方位提升教师职业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加大教师职业对一流人才的吸引力度，实现“高质量的师资和生源——高质量的培养——高质量的就业——高质量的育人和社会效应——高质量的师资和生源”的教师教育良性发展循环。

（二）内部支持层：加快建构师范生核心素养养成教育体系，厚植教师教育文化，推进教育信息化、智能化与教师教育深度融合

### 1. 加快建构以“立德树人”“三全育人”为先导的师范生核心素养养成教育体系

当下，国家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落实“立德树人”根本目标，推进和优化“三全育人”育人机制，开展“课程思政”建设。落实“立德树人”，优化“三全育人”，建设“课程思政”，教师教育及其机构。

于忠海、李莹洁基于师范专业认证理念的分析视角指出，学术性与师范性之争的综合性大学师范教育的归宿在于实践性。实践性是师范教育的第一属性——候选教师的教师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品质需要在职前培养的临床实践过程中不断磨炼。在教师教育实践中落实“立德树人”“课程思政”国家教育意志，需要将师范生的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第二课堂活动、党建团建活动等统合成为师范养成教育体系的育人闭环（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并对该闭环进行育人目标的顶层设计，即建构师范生核心素养养成教育体系。

操作层面上，加快建构以“立德树人”“三全育人”为先导的师范生核心素养养成教育体系需要把握：其一，制度保障上，加强学校、学院和专业教研室三级分工与协同，出台相关规章制度保障大学生核心素养养成教育顺利实施；其二，评价保障上，采用第二学分机制激励候选教师自主修炼，并采取四年全程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综合评价机制，确保其实施效果和运作质量；其三，教育内容上，重点夯实教师基本功的养成教育和专项实践训练，突出“五育并举”“师德为先”等价值



维度；其四，教育形式上，通过学校的顶层设计将相关课程教学与第二课堂活动、党建团建活动衔接化、模块化、系统化，真正形成“三全育人”的有效闭环。

## 2. 厚植教师教育文化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秉承我国优秀师范教育文化传统，当下在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教师教育培养机构中应当厚植教师教育文化，并积极发掘教师教育现代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大力宣传身边的优秀教师教育者和候选教师典型：第一，通过优化教师教育校园环境，如校园雕塑（景观）、文化墙、展示板、文化标语等，主动营造良好的教师教育校园环境和课堂环境，凸显环境育人功能。第二，通过建构师范大学生终身服务数据库或相关跟踪研究，积极发掘、跟踪本校候选教师的就业、上岗和专业发展情况，积极培育优秀校友资源，经常开展校友合作、经验交流和专题报告，让更多的候选教师树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情怀。第三，通过党建团建活动，积极发掘身边的教师教育者（含管理者）、候选教师的典型楷模，学习他们立德树人的先进事迹，在教师教育机构内部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 3. 推进教育信息化、智能化与教师教育深度融合

相对于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新时代教师队伍现代化建设目标而言，当下教师教育与教育信息化、智能化的交叉融合不充分，显著制约了该目标的全面实现。

一方面，教育信息化、智能化在教育界正如火如荼地推进：2018年4月，《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通知》明确提出，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是顺应智能环境下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充分激发信息技术革命性影响的关键举措，是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其主要任务是继续深入推进“三通两平台”，持续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

另一方面，教育信息化、智能化在教师教育试点和实施中存在简单化倾向，即一部分教师教育者和教师教育机构在实施过程中将其简单理解为“教师教育课程”+“信息技术”/“AI技术”，“为应用而应用”，实则成为噱头和点缀；两相对比，教师

教育领域的教育信息化、智能化目前还存在“外热里冷”“口号式推进”等不少现实问题。

实质上，教师教育与教育信息化、智能化的深度融合要求全面提高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和智能教育教学水平，促进教师教育全方位、全时空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提升，而远非几门课程套上“信息技术”的外壳那么简单。推进教育信息化、智能化与教师教育深度融合，必须在管理方式、教学方式、评价方式等重要维度进行全面改革：

其一，管理方式上，应当大力倡导以“第二类学分”机制为抓手，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统筹课堂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养成教育体系以及学生社团活动、党建团建活动，构建教师教育信息化、智能化“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管理闭环。

其二，教学方式上，应当通过构建线上线下教学长效机制推进教育教学的信息化、智能化变革。线上线下教学长效机制要求教师教育者必须首先通过自主修炼、基层教学组织、职后训练更新自身教育教学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同时，教师教育机构的信息化硬件、软件建设和投入应建立远景目标，制订科学规划，以满足教师教育信息化、智能化长期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需求。

其三，评价方式上，应当遵循《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基本原则，推进新时代教师教育评价改革从“五唯”走向育人效果。推进教育信息化、智能化与教师教育深度融合必然要求教师教育的课堂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养成教育体系通过教育信息化、智能化来提升师范生的学习体验，提供现代化的沉浸式教学真实或仿真情境，提升师范生的教学互动实践经验和批判性思维水平。而对教师教育的科学评价也应及时转变方式方法，聚焦到师范生的信息检索与处理水平、教学信息化水平、批判性思维水平、中小学一线教学实践适应性等评价维度上。

（三）外部支持层：加快建设教师教育学科体系，同时优化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体系

### 1. 加快建设教师教育现代学科体系

杨跃较早地对教师教育学科体系进行了理性思考。他认为，根据独立学科的研究对象专门性、研究方法科学性、知识体系独特性的判断标准，教师教育完全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由于我国教师教育研究对象庞杂、研究视角单一、知识体系破碎、学科性质歧见、学科建制稚嫩，其学科化水平还远未成熟。

王健则侧重于从当时教师教育学科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入手，论及我国教师教育学科建设策略应以学科制度和课程建设为重点，以学科队伍和研究发展为基石。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意见》明确提出了“两个支持”“四个全面”在这一背景下，朱旭东认为：对于落实“两个支持”和“四个全面”而言，教师教育学科建设既是手段又是目标。在教育学科制度下，教师教育（现代）学科制度内容至少包括幼儿园教师教育、小学教师教育、中学教师教育、大学教师发展、特教教师教育、职教教师教育六个专业；同时，也可以按照教师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进行三维划分：教师教育的人才培养建设，其标志工作就是要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中确立教师教育学科，相关高校据此设置教师教育教授职称；教师教育的科学研究建设，其标志工作就是要在国家级和省部级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列入教师教育学，建立教师教育研究的课题评审制度；教师教育的社会服务建设，其标志工作就是要鼓励教师教育教授参与教师培养、教师培训等支持服务工作，建立服务标准和绩效奖励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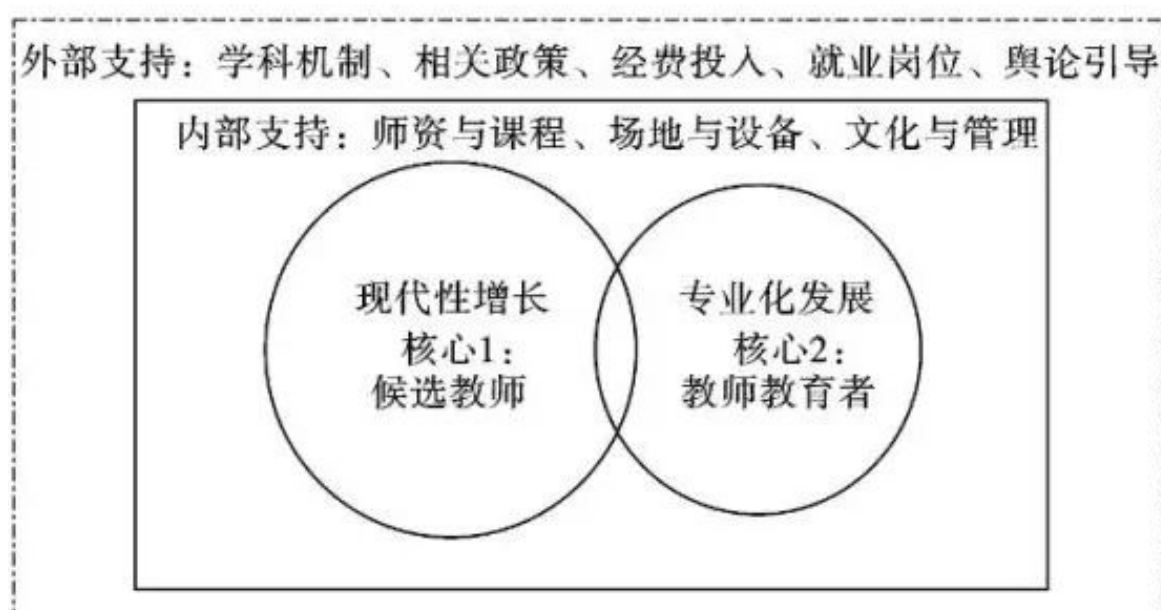
龙安邦和余文森从教师教育的学科性质分析入手，指出：教师身份的逻辑转换、教师知识的逻辑升级、教师培养的逻辑拓展是教师教育学科的逻辑基础；基于教师教育学科的逻辑特性，建设具有专业凝聚力的学科建制，探索多元一体的学科知识构架，构建实践取向的课程体系，是教师教育学科建设的三大路径。

然而，截至2021年3月，我国教师教育仍未被列入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制订的教育学二级学科，上述六个专业的构想也尚未落实；并由此造成了国家级和省部级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还没有建立“教师教育学”专项或分类栏目，而专门的教师教育服务标准和绩效奖励制度也没能建立起来。由此可见，由于教师教育的学科定位尚未明确，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专门体系建设受到了负面牵连。

教师教育现代学科体系建设的相对滞后，深刻影响到中国教师教育现代化进程：由于没有教师教育学科，中国师范院校学术研究匮乏、学术影响力严重不足；由于没有教师教育学科（地位），中国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积极性不高；由于没有教师教育学科，中国各级各类教师培训和教师专业发展的专业化水平不高，教师培养培训的底线质量和终身、可持续发展质量难以保证。由此可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学科体系是“十四五”时期振兴教师教育的首要任务。

## 2. 优化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体系

在人们的印象中，非师范院校的存在感显著低于师范院校，只是作为师范院校的“有益补充”而存在。但现实情况却远非如此：



2010年，我国师范院校的师范在校生合计为125.85万人，本科 专科 中专三级占比为54.0% 24.5% 21.5%；同年，我国非师范院校在校生合计为127.64万人，本科 专科 中专三级占比为42.7% 26.7% 30.6%。由此可见，从师范生培养数量上讲，非师范院校占据了“半壁江山”，从培养层次上来比较，非师范院校整体上在中专、专科两个层次的培养比例较高；从教师职前培养机构的数量上来看，非师范院校共计2316所，师范院校合计332所，前者是后者的6.98倍。由此可见，我国非师范院校不仅数量众多且在本科以下层次占据了“主体”之位。

透过表 1 的数据不难发现：非师范院校中的综合大学、综合学院、独立学院、高等职业院校和高等专科学校是其本、专科层次师范生培养的主力军，而中专技工职高学校、成人中专学校、广播电视大学则定位于中专层次的师范生培养。从本、专科层次师范生培养的校均规模来看，综合大学最大，综合学院和独立学院次之，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又次之。

当下，现实问题在于：在本、专科培养层次的非教师教育机构中，高等职业院校的数量最多，但其本、专科（主要是专科）层次师范生培养的校均规模和生源质量又最低——教师教育现代化背景下优化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体系的重点应当聚焦于高等职业院校的培养定位和生源质量问题。由于历史原因，一些高等职业院校保有教师教育改革前中等师范院校的优质师资，但由于培养定位与市场需求冲突、生源质量较低，其培养成效并不明显，亟待通过提升办学层次（如升为本科层次的职业大学）来解燃眉之急；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在大众的升学观念及其现实选择中，职业教育“天然”就不如普通教育，即便升格为本科层次的职业大学，对于高等职业院校教师教育生源质量的提升也将较为有限。因此，必须对“鱼龙混杂”的高等职业院校进行教师教育培养资质和质量筛选，淘汰一批不合格的教师教育机构，加强对合格机构的支持和引导，以此作为实现优化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

总之，在突出师范院校办学主体地位的形势下，高等职业院校通过师范专业认证实现“优胜劣汰、有序退出”以及“精简专科、优办本科”教师职前培养的发展战略是优化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体系的必由之路。

长江教育研究院是在湖北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由华中师范大学和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联合发起，于2006年12月16日成立的教育研究机构。

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在中国智库索引评选中社会智库类 *MRPA* 测评综合排名全国第三，*MRPA* 资源效能测评全国第一。2017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2017年度中国核心智库”。2018年在中国智库索引社会智库类 *PAI* 值评分榜全国第二。2019年，荣获中国教育智库联盟“最具影响力智库”称号。我院研究成果《<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中西部6省12县(区)120余所乡村学校调研报告>系列成果》《关于贫困地区贫困生的家庭背景、教育期望教育需求情况的调查与建议》及《疫情对我国教育的综合影响及应对策略系列成果》分别荣获由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联合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共同评选出的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 *CTTI* 来源智库精品成果奖。

目前，长江教育研究院正在按照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与教育行政部门、科研机构与高校的战略合作，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改革和发展，力争把自身打造成国内外一流的智库。



联系电话：027-87671389

官方邮箱：[cjy2006@cjy.com.cn](mailto:cjy2006@cjy.com.cn)

官网地址：<http://cjy.com.cn/>

公司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268号省出版文化城B座6楼